

# 绑架

■修新羽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陈教授。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看到你和你的科研团队在一起，应该这么称呼它吗？那些你教过的学生，那些你花重金从国外聘请的人。你们站在镜头前，以科学家特有的笨拙来接受采访。而真正吸引我的是你脸上的表情，陈教授，是看向摄影机的眼神，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眼神：仿佛看到了即将降临的荣耀与幸福。

很抱歉，陈教授。  
不，不是因为“绑架”而抱歉，我是替你感到抱歉：居然只有通过绑架的方式，才能让你回来看看。但我们即将谈论的东西，肯定比你原定要参加的国际会议有趣得多，重要得多。

无需恐惧。在你对面的这位年轻人并不是死了，全身瘫痪而已。可怜，全身瘫痪的年轻人。别看了，也别朝窗外看。我再重申一下规则：我说什么，你照办什么。

不是在威胁，只是想要确保一下沟通效率。  
首先，向你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科学恐怖主义者”。这是那些记者在报纸上发明的说法，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毕竟我们才是受害那一方。更何况我们讨厌科学，至少讨厌你们口中那种冠冕堂皇的能够推动全人类进步的科学。

30年了，陈教授。  
每年的“克隆人纪念日”，才会有几家媒体象征性地做采访。最初你也会来，对吧，我见过照片墙上你和大家的合影，锦旗，果篮，会议室，还有那些发言稿，感谢我们为科学事业所做出的牺牲。听众们热情鼓掌，热泪盈眶，反正牺牲的又不是他们。

这些年你渐渐不再来了，我亲爱的父亲。人们心照不宣地把我们忘了。  
别怪我太唐突。我确实应该叫你父亲，你是克隆人之父，是我们每个人的父亲。你为这些孩子做过什么呢？你好像想起来什么了，对吧。你的眼睛可真不会说谎。

你号召大家捐款，并最终拿到了国家资金，设立了这座社会供养站。于是，我们就得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因为我们太脆弱了，我们的基因充满瑕疵，也没有什么合法身份……我们无法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想面对我们。

我们是怎样的一些人呢。  
有些永远学不会10以内的加减法，无法行走，只能听懂“吃饭”“睡觉”这样的词语，还没有院子里的牧羊犬聪明。大脑无法支配思想的，小脑无法支配四肢的，两个眼球分别朝左朝右的，舌头缩不回去的。三只胳膊的。没有眼睛的。总在哭泣的。

就像是动物，还是那种最不可爱的，人们随手杀掉再连骨带皮吃掉，都不会觉得愧疚惋惜的那种动物。  
“科学前进的道路上注定要有牺牲”，你是这么说的，对吧。我能理解，我们都能理解。或许我们还应该感谢：至少你让我们活了下来。

那时候人们等待了太久。人们已经能够登上火星，让所有的汽车和飞机都实现自动驾驶，飞船与空间站早就司空见惯了，停滞不前的是生物学。攻克癌症之后，人们茫然四顾，束手束脚，不知道什么才是接下来的目标，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挥舞着手中的科学之剑，去与死亡的阴影搏斗。

你们课题组给出的答案是，制造克隆人。  
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群哲学家，但他们没什么钱，对业界造成不了什么影响，也没多少人在乎他们说了什么。更何况，还有些哲学家是站在你们这一边。道德伦理在科技进步面前不值一提，你们都这样想。然后是基督教信徒……他们觉得只有上帝才有造人的权力，才是所有人的父亲。

你说想要发展克隆性治疗技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不直接克隆器官。其实目的和用途都是借口，你只是想要克隆出人类而已。你一意孤行。  
你那时候陷入了科研瓶颈，你带领的项目组很难申请到国家基金了，必须要以这种方式，必须要取得



大，就好像那些眼角的皱纹也能在这样努力的挣扎中被抹平，就好像过去的30年能被抹平。你很久没有过这么有趣的表情了，我真想再多看几眼，所以请保持住它五分钟。

停止挣扎吧，你早就应该学会如何服从。  
是的，是的，是的。通过神经电流。通过我们在你后颈脊柱安装的那个小盒子。

我们做了这个实验。失败了很多次，当然。很多人因此得了精神分裂，319号，在倒数第二次手术时产生排斥。939号，内置传感器突然短路，他悄无声息地倒在地上，每根神经都被烧焦了。这是多可怕的酷刑，但凡失败就命丧黄泉。

你一定明白这是什么感觉。在你制造克隆人的时候，每天观察，测试，看着数以百计的胚胎在仪器里挣扎。看那些不同的母亲怀着同样的孩子，分娩，鲜血，挣扎，看着人们诞生随即死去。那时候你是所有这些生命的决策者，他们在毫无自我意识的时候就被你安放在整套试验流程里。

而在我们的实验中，受试者都是自愿的，真真正正自愿的，我们做梦都想让实验早日成功……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这个设想，你认为这不可能实现。由于你在科学界里举足轻重的地位，遭到你反对后，相关研究根本没办法继续开展。那些心有郁结的年轻科学家很好拉拢，只要给他们足够的钱，足够的志愿者。事情没那么困难。

更何况莫教授也帮过我们。在你确立了学界威望之后，他被排挤到了边缘。他来过这里，在目睹了太多太多自己的克隆品死后，他精神几乎崩溃，一次次要求家人将他送到这里，送到我们身边。

你爱我们如孩子，而他爱我们如兄弟。  
后来他偷偷偷了出来，把自己的科研笔记留给了我们，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悬挂在了这间看护室门口。就是这间看护室，陈教授，这里也是第一个莫教授克隆品死去的地方，又小又虚弱，却挣扎着活到了3岁。

陈教授，我说得没错，对吧。这里更重要。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远比那些无聊至极、自吹自擂的学术会议重要。

陈教授，今天之前我们曾经见过面，今年5月31日，克隆人成功的30周年纪念日。你记得我当时拉住你的手，跟你讲述那些寒冷的夜晚和我内心的恐惧吗？一次次实验，手术在我脊背的位置留下了僵硬扭曲的疤痕，直到此刻它们还在隐隐刺痛。不，你什么都不记得。你只是摆出一副亲切的姿态，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如何攻克了科研难关，如何规划着未来的生物学医学图景。你敷衍地拍了拍我的手背，露出你那标志性的虚伪笑容。

我给你过机会，让你自己来改正那些过错。我信任过你，如果你当时认真倾听了我的话，你就会预感到阴森不祥的命运，就会从我的手中挣脱出去。那么在接下来的组会上，你会和科研团队们讨论这件事，你会说，那座社会供养站完全就是地狱，生活在那里的人每天只能盯着空白的天花板，他们的手心又冷又湿，他们眼里装着整个冬天的冰雪。你会说，那是群疯子，因为他们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承受苦难而彻彻底底地发疯了，他们在谋杀掉自己，也在策划着谋杀掉别人。你会明白的。

还有武汉的一家拉面馆，起初是朋友告诉我这家店的面很好吃，是个老店，我去探寻，此后便老去了。拉面馆不是戴小圆帽的甘肃人开的兰州拉面店，是本省的一家子开的，雇了两个人，一个人拉面，抻面，下锅，一个人用长筷子捞面，装碗，老板娘收钱，下调料，递碗，打包，男主人在后面照着机器轧面，一间10多平米的店面，5个人在里面忙活。店面简单，很能见出年头了，房子较旧，地板砖上的白瓷都被年深月久的顾客的鞋子磨去了，生意却很红火，逢周末，门口排着长队，一对比，旁边那家早餐店显得很寥落。门面虽只有一间，还摆了两张窄桌供人坐着吃，却常常被排进屋的顾客挤得不好坐，于是有时桌椅干脆是空的，人们端着面在门口站着吃，或坐在门口小板凳上就着高些的塑胶凳，把面碗放上面吃，成为街边一景。面馆生意这么好，我想与它的老板娘分不开，她总是一张朴实的笑脸，用我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询问顾客“要不要辣椒”，她的手很伶俐，面前几排空碗，只十来秒，里面就都撒好了葱蒜醋等调料，面下好进碗了，我说声“帮我打下包”，她不慌不忙却又快速地扯个小袋子，不慌不忙地捏起汤碗装进去，盖上盖子，再把袋子拎匀提给我，继续不慌不忙又快速地照顾下一只碗。店里一年四季似乎没有假日，恐怕只有春节才能休息几天，夏天，我排队进店，靠锅炉很近，一股热浪围绕着食客，老板娘身上套件围裙，站在锅炉旁忙碌，脸上出了汗就抬手擦擦，冬天倒好，靠着锅炉不冷，她只穿件秋天的绒布外套。每天从早上五六点开始，她站在铁皮桌后面方寸大的地方，忙碌到中午一点打烊，整个半天，不管我几点钟去，都看不到她显出累的样子，脸上总是那副习惯的笑模样，有时我中午去吃面，店里已没几个人了，这时她轻松下来，也还是站在方寸大的地方，手撑着桌面，放松地歇歇，以备随时而来的零散顾客。老板娘的面容和一双灵活的手，总使我想起譬如画糖人，做棉花糖那类技术娴熟的手艺人。

如今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缝缝补补的小摊位了，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拉链坏了，人们很少再想到去修补，而是买件新的。我总记得几年前的一家裁缝铺，开在一条窄街巷里，小小的门脸，里面挂满了布匹和各种衣服，几乎是衣服山中刨出来的一块小地方，放着一张缝纫机，里面坐着裁缝。当我循着打听到的裁缝铺，第一次找到这条窄街，走到铺子门前，要看几秒才能从屋里堆得像山高的布料衣服中看到缝纫机上埋首做衣服的裁缝。大概总是静默做事，我走进去，过一会她才抬起头来，问衣服怎么了。我在那里补过几回衣服，衣服上的铜扣掉了，拿去缝上，裤子拉链坏了，换过拉链，新买的衣服不合身也拿去那里改。每次去裁缝铺，她都在埋首顾着手中衣服，有时踩着机器在纫，有时拿针在缝。中午沉闷易困的时分，一只收音机挂在缝纫机上，随便播着什么，她安心地做着手里的活。逢到人来，她说话不多，问完说必要的，又埋头手中的活儿了，可是她暗黄的面容，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让我觉得每天重复地做着衣服，修补着衣服，也是熬人苦累的。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作，去过几次裁缝铺后，感到这是个吸引我的素材，可以写写，却总是懒得动笔。后来有次骑车经过那条窄街，看到裁缝铺门口放了块泡沫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即将搬走，我便决定不能再拖了，等铺子搬走，我再见不到静谧街巷中的这间铺子，时间一长就会忘，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去写它了，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裁缝铺》，以纪念这间小铺子和它辛苦劳作的主人。

疫情时期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有时感到不安，只是没有亲朋好友受到病毒感染，便没有很强烈的悲伤和担忧。后来，我从老家回武汉，当动车到达汉口站，我从车上下来，一踏上站台的地面，便立马感到一种特殊的情愫，那种感觉和我在家里体味到的完全不一样，想起新闻里那些守在武汉的人们在最困难时表达出的种种感受，我此刻才后知后觉地体味到一二。而快递店的老两口，菜场的摊主，面馆的老板娘，裁缝店的主人，还有很多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在疫情期间好吗？家人都是平安的吗？我很想再去他们店里，像平常那样见到他们，随便聊几句天。

## 主题词写作——

# 想见你

足够爆炸性的成果来博得一线生机，重新站回学界的领先地位。科学院院长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把意见最大的科学家都请过来，大家讨论了整整两周。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要你公开地，在媒体的全程监督下，公开透明地进行试验。

第一个克隆人胚胎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媒体兴奋极了，长篇累牍地争论或科普。那个孩子被生下来之后，看似一切正常，不出三个小时就因为血小板浓度过高而夭折。随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有些人依旧在质疑，不过木已成舟。新闻报道的篇幅越来越短。

人们只是看着，陈教授。有些时候注视即漠视，媒体让一切都变了样，人们只是看着，仿佛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却一无所知。他们变成了旁观者，他们像看彩票开奖那样，随意浏览着报纸边栏里充满猎奇趣味的小消息。

那些充满猎奇趣味的，大量的，克隆残次品的命运。  
现在，陈教授，请回想一下，刚开始克隆的时候你都做过什么呢？  
你用过莫教授的基因。我查到过他的资料。他是你师兄，在你刚进实验室的时候就已经发表过很多顶级期刊的论文，你导师一直叮嘱你向他学习。他也确实很热心地指导你进行试验……他是那种最单纯的学者。不懂政策导向，没有抓住时机，他反对过克隆人，他劝过你，把事情考虑好了再行动。

莫教授比你聪明。论科学成就的话他当然没法和你比了，你是克隆人之父，对吧。然而，如果仅仅讨论基因和天分，莫教授确实比你更聪明……甚至比你更健康，更适合用来做实验。

现在，仔细观察一下你对面那个轮椅上的人。  
眼熟吗？或者说，想起来了吗？看看他下巴的轮廓，他高高的眉骨，有没有从记忆中唤起哪个模糊的影子？30年前的莫教授，对吧。坐在你面前的，是用莫教授细胞制作的第32个克隆人，在实验室里顺利长到了10岁，还被你们安排着出去读了高中，接受最频繁的测试，你们以为他会是完美的。直到他18岁那年，直到他的左手开始颤抖，逐渐显露出肌萎缩侧索硬化病的征兆。“渐冻症”，病因至今不明，八成的病例和遗传缺陷有关。你们试探性地治疗了几个月，为了节省科研精力，最终还是放弃了他。

你们最终还是放弃了我。  
你开始明白了。这个在轮椅上的人就是我，这个正在说话的广播器是我，整座社会供养站都是我。在人类幽深难测的思维意识与外部物质世界之间，我们凿穿了一座通道。看，门开了，门关了。这个房间的灯也能随着我的意念而忽明忽暗，真有意思，就像鬼片里的场景，对吧，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我们能做到的还不仅如此。  
你的眼睛。我从未想象过你的眼睛能睁到这么



张春莹

回顾去冬今春几个月来因疫情许久未见的人，恐怕是疫情开始前生活中常常碰见接触的人们。在新冠肺炎披露蔓延前，我已回了老家，那时未知未觉，根本不知有新冠肺炎这回事，回家的车上也没有人戴口罩。几天之后疫情陡然严峻起来，回想当时的浑然不觉，有点惊怕——那时我没抢到在汉口站上车，去了武汉站坐车，如果是在汉口站上车，我恐怕有一半可能会感染上，把病毒带回家，因为疫情初期许多被感染的人去过汉口火车站。

在家过的头14天，时时警觉，一看手机上的新闻，就有自己已被感染还未发觉的恐惧。14天一过，渐渐不担心了。看着疫情最为严重时期的新闻，我很多次庆幸自己先一步回家了，否则要是困在武汉不知会有怎样的煎熬。在武汉时，时常想念家里的菜，有阵子尤其想家里烧的鱼，而今回来了，天天吃妈妈做的饭菜，感觉是温馨的幸福，若困在武汉，这几个月最想念的人肯定是妈妈。

现在疫情大大缓解，生活逐步恢复，为彻底遏制病毒，武汉的防守还是很严，因这病毒实在不按常理出牌，狡猾异常。生产生活虽在渐渐恢复，一些生活秩序还是打乱了，现在要说想见的，就有与我平时吃喝住行紧密相连的人，我很想知道他们还好不好，有没有躲过病毒，平安地度过这几个月。

比较想念的，有楼下小快递店的一对夫妇，他们年龄有60岁了，除收发快递，店里还卖些水果，我常常去他们店拿快递，偶尔寄快递。夫妇俩口音不知是哪里的，我听不出来，有次我问他们老家是哪里的，答说河南的。老两口非常勤快，每天很晚了还在里面忙活，遇到“双十一”之类的购物节，快递多得店里都快摆不下，我们取快递的人排了队去领，老两口做事默契十足，取件的人把单号告诉女主人，她回头告诉男主人，男主人便在一排排格子紧张地快速地找。到我领快递了，往里看，他头上都是汗，入冬的天只穿一件单衣，背上都汗湿了。有时饭点我去拿快递，看到他们正吃饭，吃的是小电饭煲随便煮的一点什么，有时吃的外卖。即使在吃饭的歇闲时分，他们也要快点吃完，快递员来送货，收货，有人来拿快递，都能随时打断他们吃饭，急忙忙去顾生意。

偶尔去的菜场，我第一次在一个卖小菜的摊位前停驻下来时，站在摊位里的男人让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生意人，倒像个坏人，黑黑的皮肤，个头不高，比较壮实，每次看到我都想到“凶神恶煞”这个词，比肉店拿割肉刀的伙计更能让人想起屠夫，他确实很像电视里一个常演坏人的类型演员。然而当我靠近摊位，他开口了：买点什么？声音竟是很柔和，声量也不大，随之递来一只小塑料篮子，我于是想，即使不需买什么也不好意思不买点什么了。买了菜后，他放在塑料袋装好，两只手递给我，说声“慢走”，我受宠若惊。此后，每次去菜场，都在他摊位买点葱或青椒，尽管只是几块钱的生意，他也非常周到热情。

老家我常去的面馆，收银小妹妹是一个也许和我差不多大的四川女孩，我每次去，都能听到她嘴里哼着歌，有时客人点了餐，她会转过头大声用四川话跟师傅招呼下一碗什么面。此后我回了武汉，再去那儿过早，走到门口扫码，还没报吃什么面，就听她用四川话说了声“鸭汤面”，又说，你好久没来了。每天店里那么多客人，且我还戴着口罩，没想到她还记得我。我说，我去武汉了，这几天放假才回来。鸭汤面是这家面馆的招牌面，我每次都吃这个面，写到这里，我脑中响起了那声四川调的“鸭汤面”，这句方言我也学会了。

还有武汉的一家拉面馆，起初是朋友告诉我这家店的面很好吃，是个老店，我去探寻，此后便老去了。拉面馆不是戴小圆帽的甘肃人开的兰州拉面店，是本省的一家子开的，雇了两个人，一个人拉面，抻面，下锅，一个人用长筷子捞面，装碗，老板娘收钱，下调料，递碗，打包，男主人在后面照着机器轧面，一间10多平米的店面，5个人在里面忙活。店面简单，很能见出年头了，房子较旧，地板砖上的白瓷都被年深月久的顾客的鞋子磨去了，生意却很红火，逢周末，门口排着长队，一对比，旁边那家早餐店显得很寥落。门面虽只有一间，还摆了两张窄桌供人坐着吃，却常常被排进屋的顾客挤得不好坐，于是有时桌椅干脆是空的，人们端着面在门口站着吃，或坐在门口小板凳上就着高些的塑胶凳，把面碗放上面吃，成为街边一景。面馆生意这么好，我想与它的老板娘分不开，她总是一张朴实的笑脸，用我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询问顾客“要不要辣椒”，她的手很伶俐，面前几排空碗，只十来秒，里面就都撒好了葱蒜醋等调料，面下好进碗了，我说声“帮我打下包”，她不慌不忙却又快速地扯个小袋子，不慌不忙地捏起汤碗装进去，盖上盖子，再把袋子拎匀提给我，继续不慌不忙又快速地照顾下一只碗。店里一年四季似乎没有假日，恐怕只有春节才能休息几天，夏天，我排队进店，靠锅炉很近，一股热浪围绕着食客，老板娘身上套件围裙，站在锅炉旁忙碌，脸上出了汗就抬手擦擦，冬天倒好，靠着锅炉不冷，她只穿件秋天的绒布外套。每天从早上五六点开始，她站在铁皮桌后面方寸大的地方，忙碌到中午一点打烊，整个半天，不管我几点钟去，都看不到她显出累的样子，脸上总是那副习惯的笑模样，有时我中午去吃面，店里已没几个人了，这时她轻松下来，也还是站在方寸大的地方，手撑着桌面，放松地歇歇，以备随时而来的零散顾客。老板娘的面容和一双灵活的手，总使我想起譬如画糖人，做棉花糖那类技术娴熟的手艺人。

如今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缝缝补补的小摊位了，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拉链坏了，人们很少再想到去修补，而是买件新的。我总记得几年前的一家裁缝铺，开在一条窄街巷里，小小的门脸，里面挂满了布匹和各种衣服，几乎是衣服山中刨出来的一块小地方，放着一张缝纫机，里面坐着裁缝。当我循着打听到的裁缝铺，第一次找到这条窄街，走到铺子门前，要看几秒才能从屋里堆得像山高的布料衣服中看到缝纫机上埋首做衣服的裁缝。大概总是静默做事，我走进去，过一会她才抬起头来，问衣服怎么了。我在那里补过几回衣服，衣服上的铜扣掉了，拿去缝上，裤子拉链坏了，换过拉链，新买的衣服不合身也拿去那里改。每次去裁缝铺，她都在埋首顾着手中衣服，有时踩着机器在纫，有时拿针在缝。中午沉闷易困的时分，一只收音机挂在缝纫机上，随便播着什么，她安心地做着手里的活。逢到人来，她说话不多，问完说必要的，又埋头手中的活儿了，可是她暗黄的面容，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让我觉得每天重复地做着衣服，修补着衣服，也是熬人苦累的。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作，去过几次裁缝铺后，感到这是个吸引我的素材，可以写写，却总是懒得动笔。后来有次骑车经过那条窄街，看到裁缝铺门口放了块泡沫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即将搬走，我便决定不能再拖了，等铺子搬走，我再见不到静谧街巷中的这间铺子，时间一长就会忘，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去写它了，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裁缝铺》，以纪念这间小铺子和它辛苦劳作的主人。

疫情时期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有时感到不安，只是没有亲朋好友受到病毒感染，便没有很强烈的悲伤和担忧。后来，我从老家回武汉，当动车到达汉口站，我从车上下来，一踏上站台的地面，便立马感到一种特殊的情愫，那种感觉和我在家里体味到的完全不一样，想起新闻里那些守在武汉的人们在最困难时表达出的种种感受，我此刻才后知后觉地体味到一二。而快递店的老两口，菜场的摊主，面馆的老板娘，裁缝店的主人，还有很多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在疫情期间好吗？家人都是平安的吗？我很想再去他们店里，像平常那样见到他们，随便聊几句天。

如今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缝缝补补的小摊位了，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拉链坏了，人们很少再想到去修补，而是买件新的。我总记得几年前的一家裁缝铺，开在一条窄街巷里，小小的门脸，里面挂满了布匹和各种衣服，几乎是衣服山中刨出来的一块小地方，放着一张缝纫机，里面坐着裁缝。当我循着打听到的裁缝铺，第一次找到这条窄街，走到铺子门前，要看几秒才能从屋里堆得像山高的布料衣服中看到缝纫机上埋首做衣服的裁缝。大概总是静默做事，我走进去，过一会她才抬起头来，问衣服怎么了。我在那里补过几回衣服，衣服上的铜扣掉了，拿去缝上，裤子拉链坏了，换过拉链，新买的衣服不合身也拿去那里改。每次去裁缝铺，她都在埋首顾着手中衣服，有时踩着机器在纫，有时拿针在缝。中午沉闷易困的时分，一只收音机挂在缝纫机上，随便播着什么，她安心地做着手里的活。逢到人来，她说话不多，问完说必要的，又埋头手中的活儿了，可是她暗黄的面容，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让我觉得每天重复地做着衣服，修补着衣服，也是熬人苦累的。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作，去过几次裁缝铺后，感到这是个吸引我的素材，可以写写，却总是懒得动笔。后来有次骑车经过那条窄街，看到裁缝铺门口放了块泡沫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即将搬走，我便决定不能再拖了，等铺子搬走，我再见不到静谧街巷中的这间铺子，时间一长就会忘，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去写它了，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裁缝铺》，以纪念这间小铺子和它辛苦劳作的主人。

疫情时期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有时感到不安，只是没有亲朋好友受到病毒感染，便没有很强烈的悲伤和担忧。后来，我从老家回武汉，当动车到达汉口站，我从车上下来，一踏上站台的地面，便立马感到一种特殊的情愫，那种感觉和我在家里体味到的完全不一样，想起新闻里那些守在武汉的人们在最困难时表达出的种种感受，我此刻才后知后觉地体味到一二。而快递店的老两口，菜场的摊主，面馆的老板娘，裁缝店的主人，还有很多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在疫情期间好吗？家人都是平安的吗？我很想再去他们店里，像平常那样见到他们，随便聊几句天。

如今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缝缝补补的小摊位了，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拉链坏了，人们很少再想到去修补，而是买件新的。我总记得几年前的一家裁缝铺，开在一条窄街巷里，小小的门脸，里面挂满了布匹和各种衣服，几乎是衣服山中刨出来的一块小地方，放着一张缝纫机，里面坐着裁缝。当我循着打听到的裁缝铺，第一次找到这条窄街，走到铺子门前，要看几秒才能从屋里堆得像山高的布料衣服中看到缝纫机上埋首做衣服的裁缝。大概总是静默做事，我走进去，过一会她才抬起头来，问衣服怎么了。我在那里补过几回衣服，衣服上的铜扣掉了，拿去缝上，裤子拉链坏了，换过拉链，新买的衣服不合身也拿去那里改。每次去裁缝铺，她都在埋首顾着手中衣服，有时踩着机器在纫，有时拿针在缝。中午沉闷易困的时分，一只收音机挂在缝纫机上，随便播着什么，她安心地做着手里的活。逢到人来，她说话不多，问完说必要的，又埋头手中的活儿了，可是她暗黄的面容，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让我觉得每天重复地做着衣服，修补着衣服，也是熬人苦累的。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作，去过几次裁缝铺后，感到这是个吸引我的素材，可以写写，却总是懒得动笔。后来有次骑车经过那条窄街，看到裁缝铺门口放了块泡沫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即将搬走，我便决定不能再拖了，等铺子搬走，我再见不到静谧街巷中的这间铺子，时间一长就会忘，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去写它了，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裁缝铺》，以纪念这间小铺子和它辛苦劳作的主人。

疫情时期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有时感到不安，只是没有亲朋好友受到病毒感染，便没有很强烈的悲伤和担忧。后来，我从老家回武汉，当动车到达汉口站，我从车上下来，一踏上站台的地面，便立马感到一种特殊的情愫，那种感觉和我在家里体味到的完全不一样，想起新闻里那些守在武汉的人们在最困难时表达出的种种感受，我此刻才后知后觉地体味到一二。而快递店的老两口，菜场的摊主，面馆的老板娘，裁缝店的主人，还有很多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在疫情期间好吗？家人都是平安的吗？我很想再去他们店里，像平常那样见到他们，随便聊几句天。

如今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缝缝补补的小摊位了，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拉链坏了，人们很少再想到去修补，而是买件新的。我总记得几年前的一家裁缝铺，开在一条窄街巷里，小小的门脸，里面挂满了布匹和各种衣服，几乎是衣服山中刨出来的一块小地方，放着一张缝纫机，里面坐着裁缝。当我循着打听到的裁缝铺，第一次找到这条窄街，走到铺子门前，要看几秒才能从屋里堆得像山高的布料衣服中看到缝纫机上埋首做衣服的裁缝。大概总是静默做事，我走进去，过一会她才抬起头来，问衣服怎么了。我在那里补过几回衣服，衣服上的铜扣掉了，拿去缝上，裤子拉链坏了，换过拉链，新买的衣服不合身也拿去那里改。每次去裁缝铺，她都在埋首顾着手中衣服，有时踩着机器在纫，有时拿针在缝。中午沉闷易困的时分，一只收音机挂在缝纫机上，随便播着什么，她安心地做着手里的活。逢到人来，她说话不多，问完说必要的，又埋头手中的活儿了，可是她暗黄的面容，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让我觉得每天重复地做着衣服，修补着衣服，也是熬人苦累的。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作，去过几次裁缝铺后，感到这是个吸引我的素材，可以写写，却总是懒得动笔。后来有次骑车经过那条窄街，看到裁缝铺门口放了块泡沫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即将搬走，我便决定不能再拖了，等铺子搬走，我再见不到静谧街巷中的这间铺子，时间一长就会忘，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去写它了，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裁缝铺》，以纪念这间小铺子和它辛苦劳作的主人。

疫情时期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有时感到不安，只是没有亲朋好友受到病毒感染，便没有很强烈的悲伤和担忧。后来，我从老家回武汉，当动车到达汉口站，我从车上下来，一踏上站台的地面，便立马感到一种特殊的情愫，那种感觉和我在家里体味到的完全不一样，想起新闻里那些守在武汉的人们在最困难时表达出的种种感受，我此刻才后知后觉地体味到一二。而快递店的老两口，菜场的摊主，面馆的老板娘，裁缝店的主人，还有很多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在疫情期间好吗？家人都是平安的吗？我很想再去他们店里，像平常那样见到他们，随便聊几句天。

如今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缝缝补补的小摊位了，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拉链坏了，人们很少再想到去修补，而是买件新的。我总记得几年前的一家裁缝铺，开在一条窄街巷里，小小的门脸，里面挂满了布匹和各种衣服，几乎是衣服山中刨出来的一块小地方，放着一张缝纫机，里面坐着裁缝。当我循着打听到的裁缝铺，第一次找到这条窄街，走到铺子门前，要看几秒才能从屋里堆得像山高的布料衣服中看到缝纫机上埋首做衣服的裁缝。大概总是静默做事，我走进去，过一会她才抬起头来，问衣服怎么了。我在那里补过几回衣服，衣服上的铜扣掉了，拿去缝上，裤子拉链坏了，换过拉链，新买的衣服不合身也拿去那里改。每次去裁缝铺，她都在埋首顾着手中衣服，有时踩着机器在纫，有时拿针在缝。中午沉闷易困的时分，一只收音机挂在缝纫机上，随便播着什么，她安心地做着手里的活。逢到人来，她说话不多，问完说必要的，又埋头手中的活儿了，可是她暗黄的面容，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让我觉得每天重复地做着衣服，修补着衣服，也是熬人苦累的。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作，去过几次裁缝铺后，感到这是个吸引我的素材，可以写写，却总是懒得动笔。后来有次骑车经过那条窄街，看到裁缝铺门口放了块泡沫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即将搬走，我便决定不能再拖了，等铺子搬走，我再见不到静谧街巷中的这间铺子，时间一长就会忘，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去写它了，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裁缝铺》，以纪念这间小铺子和它辛苦劳作的主人。

疫情时期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有时感到不安，只是没有亲朋好友受到病毒感染，便没有很强烈的悲伤和担忧。后来，我从老家回武汉，当动车到达汉口站，我从车上下来，一踏上站台的地面，便立马感到一种特殊的情愫，那种感觉和我在家里体味到的完全不一样，想起新闻里那些守在武汉的人们在最困难时表达出的种种感受，我此刻才后知后觉地体味到一二。而快递店的老两口，菜场的摊主，面馆的老板娘，裁缝店的主人，还有很多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在疫情期间好吗？家人都是平安的吗？我很想再去他们店里，像平常那样见到他们，随便聊几句天。



# 五月

■庄凌

五月的青岛是蓝色的海鸥

好像每个人都长着翅膀

我坐在海边看海水

追赶着夕阳浑圆的屁股

我的身后繁花盛开

这温暖湿润的季节

青春和故事死而复生

我们也在生长

突然很想去见你

海风和云朵都停在那里

我们什么都不用说

躺在一只贝壳里，余生沉浮